

论中国网络公共修辞：形态、效果、问题与策略¹

(On public Internet rhetoric in China: Current forms, effects, problems and strategies)

陈汝东
Rudong Chen

In recent years internet communication has rapidly developed and become popularised in China. The Internet has become not only an important media through which Chinese people deal with daily affairs but also constitutes important forms of new social relationships, social constructions and social culture in China. Discourse on the Internet has changed from individual discourse to public discourse, from Netizen discourse to national discourse. The content of Internet discourse in China has changed from expressing individual feelings, thoughts and wills at the beginning of Internet's rise in the 90s to expressing public opinions and manifesting participation within public affairs and public policies, and it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regarding the creation of public affair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policies. Many public policies have been made, put into force, and become supervised and adjusted greatly because of Netizen's participating through discourse. As an important means of raising the efficiency of discursive Internet communication, rhetoric and its studies have also moved from individual rhetoric to public rhetoric and from Netizen rhetoric to national rhetoric.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systematically summarises forms of public rhetoric on the Internet in China based on his studies of public rhetoric in recent years. He analyzes these problems derived from public rhetoric on the internet as well as their causes. Finally, the author also puts forward some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the competence of public rhetoric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et communication. It will be a great help in raising the efficiency of internet communication and constructing a new national culture of China.

摘要：近年来，中国大陆的网络普及迅速。网络不仅已成为中国人解决日常个人事务的重要媒介，同时也成为中国新型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乃至社会文化的重要形态。网络话语正在从个体话语走向公共话语，从民众话语走向国家话语，逐渐从网络兴起之初的

¹本文曾发表于第13届《韩中文化论坛》（2011年8月韩国·仁川大学，主旨报告）、第2届国际修辞传播学前沿论坛（2011年10月日本·札幌大学），发表时作了补充完善。

个体情感、思想、意志等的个性表达，逐渐转向参与公共事务、公共政策，并对中国的法律法规以及其他形态的公共政策、公共事务决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和巨大的促动。许多公共政策的制定、施行、监督乃至调整，因为网民通过公共话语的参与而产生了显著变化。与之相应，作为提高话语传播效率重要手段的修辞，也正在从个体修辞走向公共修辞，从民众修辞走向国家修辞。修辞学研究也正在从个体修辞学走向公共修辞学，从民众修辞学走向国家修辞学。为此，本文作者在其近年来的公共修辞研究基础上，对中国当下的网络公共修辞形态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剖析其引发的问题和成因，最后提出了提高网民公共修辞能力，改善网络传播环境，提高网络传播效率，进行国家文化建构的策略。

关键词：公共修辞；国家修辞；国家文化；对策

一、公共修辞及其网络形态

最近几年，我国大众传播、新闻传播特别是网络传播的形态发生了许多根本性的变化，公众的修辞形态、话语形态也随之产生了许多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样类。自2009年以来，我们在长期关注中国的修辞和传播实践及其话语形态变化基础上，先后提出了国家传播、国家话语、公共修辞、公共话语等范畴。在此，本文将集中对中国近年来的网络修辞形态做一简要的概括和阐释，较为系统地分析该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公共修辞”(public rhetoric)是相对于“个体修辞”的一个概念。“所谓个体修辞，就是修辞者是社会个体实施的以自身利益为主要指向的修辞行为。个体修辞的功能最终虽然也会产生社会功能，但其出发点重在个人利益。公共修辞则是指社会个体或群体以公共利益为指向的修辞行为，其修辞动机在于公共意志表达，公共权力建构和公共政策制定。”²

近几年来，中国的网络传播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首先是出现了许多新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方法，比如博客、微博等。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新的网络修辞手段，网民创造了大量的新词，并且迅速流行，成为网络热词、网络潮语，比如“偶”、“稀饭”、“94”、“潮”、“萌”、

²陈汝东《论全球化时代的东亚修辞学教育》，《韩中语言文化研究》第22辑，韩国现代中国研究会、韩国中国言语文化研究会编，2010年2月，第3-19页。

“卖萌”、“围观”、“装嫩”、“给力”、“雷人”、“肿么”、“月光族”、“逗你玩”、“蒜你狠”、“姜你军”、“糖高宗”、“油你涨”、“苹什么”、“海豚族”、“伤不起”、“内牛满面”等等；涌现了许多新的流行短语或句子，比如近两年的“妈妈喊你回家吃饭”、“我爸是李刚”、“神马都是浮云”、“至于你信不信，由你，我反正是信的”、“你懂得”、“元芳，你怎么看”等等；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新的网络修辞方法，比如故意运用谐音方法，

³使用同音、近音词语。在上面列举的词语中，“稀饭”就是“喜欢”，“94”代替“就是”；“杯具”、“洗具”、“杯洗具”，就是“悲剧”、“喜剧”、“悲喜剧”。“酱紫”是“这样子”。“河蟹”、“围脖”分别指“和谐”、“微博”。

⁴至于“逗你玩”、“蒜你狠”、“姜你军”、“糖高宗”、“油你涨”、“苹什么”，则分别是针对2010年以来大豆、蒜、姜、糖、油、苹果等商品的大幅涨价现象创造的谐音词语。显然，谐音既是一种创造新词语的方法，同时也是一种修辞方法，旨在讽刺时下的某些不良现象。

此外，网民也采用故意写错别字的方法，比如“肿么”、“柜族”、“有木有”、“内牛满面”、“鸭梨山大”，则是谐音自“怎么”、“贵族”、“有没有”、“泪流满面”、“亚历山大”（意即“压力山大”）。为什么故意使用错别字呢？一方面是因为年轻人特别是女生，语音发“嗲”，即故意装出娇嫩的声音，有意制造错别字，以此引起他人注意，显得别具一格。

⁵另一方面，在拼音输入法中，由于同音的词语容易排在选字的前面，为

³这方面有许多文献，比如（鄢春艳《从修辞的视角看网络新词构造》，《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迪丽努尔·吾甫尔、古丽齐曼·赛买提《谈网络语言中的谐音修辞》，《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2期；王晶《浅谈网络语言中的谐音生造词》，《商业经济》2010年第3期。

⁴有人把这种谐音构成的词语称为“皮钦语”(pidgin)，即由汉语和外语构成的“混合语言”。这并不准确。“网虫”(networm)、“粉丝”(fans)、“微博”(micro blog)，具有混合语的特征，但是单纯由汉语构成的上述网络热词不同。参见陈淑霞《皮钦语的网络文体形式》，《民营科技》2010年第11期；扈畅《中国网络皮钦语的文体形式及特征》，《中国科技翻译》2009年第1期。

⁵这种方法在修辞学上叫做“飞白”，参见连晓霞《从修辞手法看网络词语蕴含的价值取向》，《修辞学习》2006年第2期。

了省事就直接用错别字。采用一些具有象形意义的生僻汉字，比如“冏”、“槩”等，也是网络修辞方法之一。“冏”取其面部表情状，表示窘迫、郁闷、无奈。“槩”则表示“很呆”、“很傻”。

近年来，在中国的网络传播领域中也不断涌现出新文体，或者说话语体式，比如“梨花体”、“羊羔体”、“菜刀体”、⁶“咆哮体”、“凡客体”、“淘宝体”、“元芳体”等等。这些文体多以行业、单位、个人命名，比如“丹丹体”、“根叔体”、“校内体”、“清华凡客体”、“北大咆哮体”、“警察卖萌体”等等，不一而足。当然，这些所谓的“网络新文体”或“网络新语体”，还没有或者说正在形成固定的规范。这些新文体使用了许多新的修辞手段和修辞方法，显得新颖别致，给人以新异的感觉，特别是能切合年轻受众的心理需要，更具有亲和力，值得肯定。一定程度上说，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文体、语体的“革命”，正在进行着国民的修辞化，网络的修辞化，中国的修辞化！

以上是近年来中国网络修辞微观上呈现出的新形态。在宏观上，中国的网络修辞，呈现出公共修辞形态。这表现在传播媒介、主体、动机、信息性质、机制、效果等诸多方面。首先，网络传播的媒介形态与既有的传播形态不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涌现了许多新的媒介形态和传播方式，继BBS、MSN、博客、播客等之后，最近几年又出现了飞信、微博等新的传播方式。这些为中国的公共修辞传播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媒介空间。微博的产生，不但使人人都可成为大众传播者，而且催生了一种短小精悍的新文体形式，且对中国的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

⁷由于一百多字的限制，发帖者必须在有限的字数内就能吸引读者的注意力，抓住读者。为此，发帖者需要动用各种新颖的修辞手段和方法。

其次，从传播主体看，如今的网络传播主体不仅从数量，而且从性质上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2012年7月19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了《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该《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5.38亿；手机网民规模为3.88亿，手机首次超越台式电脑成为第一大上网终端；微博用户达2.74亿，手机微博用户

⁶Justdo《网络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盘点2010年度热门网络文体》，《电脑爱好者》2011年第4期。

⁷张辛欣、杨玉华《中国微博用户骤增至1.95亿

微舆论深刻影响中国社会》，《新华网》2011年8月24日。

达1.70亿，微博在网民中的使用率达50.9%。

⁸这使更多的中国人参与到网络传播中，构成了推出网络新修辞现象的生力军，为新修辞现象的产生提供了技术和传播主体数量上的支持。因此，每一个社会个体都是信源和信宿。这是公共修辞传播，与既有的传统媒体修辞传播的根本不同。

再次，网络传播的动机和信息性质产生了巨大变化。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的网民多关注新闻时事，通过网络获取各种信息，重在个人情感、思想、观念的抒发，功能范围多限于个体之间的交流。新世纪以来，逐渐转向了公共事务，特别是国家的公共政策。从传播机制看，如今的网络传播，呈现出更多的公共性和即时性，比如微博，就可以实现新闻时事的公共、即时、互动传播。最后，网络传播的效果也逐渐由个体之间的信息互动，调整社会个体之间的关系，逐渐扩大为调整社会阶层关系，影响甚至干预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政策。“互联网在社会公共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⁹

我们提出“公共修辞”，是基于对修辞观的重新阐释。“修辞不仅是一种选择语音、词语、句式、修辞格等的语言运用现象，也不仅是一种运用语言、音乐、图片、图像、建筑、环境等涉及听觉、视觉、触觉等媒介符号，建构有效的文本，传播信息，以影响、改变他人情感、态度、思想、观念乃至社会行为的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它也是一种人类传播现象，是一种人类传播秩序和社会秩序，是公共权力和公共秩序建构、社会事务处理、公共政策制定的方式和方法，是一种社会公平、公正的制度体系，是一种人类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传统和文化形态。”¹⁰因此，探讨中国当下的网络公共修辞，必须进行修辞观念上的变革。

二、公共修辞的效果与问题

1、公共修辞的传播效果

公共修辞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具体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显然，目前网络公共修辞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秩序的主要传播途径。任何政治组织、社会阶层都无法忽略网络修辞的传播现实。

⁸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网站》2012年7月19日。

⁹浩钧《工信部刘利华：我国互联网业发展呈现5大特点》，《腾讯科技》2011年8月23日。

¹⁰陈汝东《新兴修辞传播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78页。

公共修辞对中国的法律、法规以及其他形态的公共政策、公共事务决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和促动。许多公共政策的制定、施行、监督乃至调整，由于网民的公共话语参与而产生了显著变化。从2003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被废止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实施，到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制定、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的诞生等等，都离不开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离不开公共修辞传播的巨大影响。

公共修辞也对新国家传播模式产生了促动。这包括以下方面，首先是公众的修辞传播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日常公共修辞主要通过网络进行。其次，政党、政府等的政治传播模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既有的传统传播模式，转向了与网络同时并存，而且逐渐依靠网络来实现。第三，对大众新闻传播的修辞模式变革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新闻修辞从原有的单纯依靠政党、政府权势的宣传模式，逐渐向依靠修辞进行说服的传播模式转变，由政治组织固有的传播程式向灵活多样的网络修辞传播模式转变。比如，在模范人物的报道中，媒体往往把人物事迹极端化，通过过度渲染人物舍弃对家庭、亲友的眷顾，而执着于集体、国家事业，表现其无私奉献精神。但是，公众已经厌倦了这种无限拔高模范人物的宣传方式，他们更喜欢具有民众亲和力的表达方式。比如，在最近的“深圳丧子交警”的报道中，网民就通过微博对拔高式报道提出了质疑，使人物的真实性得到了还原。¹¹

公共修辞对中国的传播秩序形成了新的冲击和挑战，促使中国的传播秩序进行变革。在传统媒介环境下，中国的社会、政治传播主要通过政党、政府以及各种组织传播形式实现。但是，随着网络公共修辞的发展，目前的社会舆论形成方式产生了巨大变化，舆论并不单纯依靠政党、政府和官方媒体形成，而是多种形成方式并存，而且网络公共修辞正在成为社会舆论的主要形成方式。一个网民通过微博发布的新闻事件，很可能迅速成为舆论热点，比如北大校长的“化学歌”、北大副校长的“撑腰体”等新闻热点的出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网民正在成为社会舆论的制造者和主要参与者，政党、政府舆论一统天下的局面正在发生改变。此外，中国的人际传播秩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人际网络等新媒介人际传播正在成为主要的人际传播渠道。

公共修辞也对传播主体以及公共修辞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网络等新媒介传播形态的出现和发展，公共修辞正在成为社会个体、群体抒发个体意志、公共意志，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生活的重要途径和方式，直接影响社会个体和群体乃至国家利益。因此，公共修辞能力和综合素养，正在成为社会个体、群体乃至整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的公共修辞主体以及公共修辞教育也面临新的挑战。

¹¹李涛《丧子守岗深圳交警是否“被塑造”》，《北京青年报》2011年8月15日。

总之，中国的网络公共修辞催生了新的修辞现象、新的修辞手段、新的修辞方法和新的文体、语体，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产生了广泛影响，不仅在微观上产生了积极的传播效果，同时也对既有的政治传播、新闻传播、人际传播以及传播秩序产生了巨大促动，正在促使中国的修辞传播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

2、公共修辞领域存在的问题

公共修辞固然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也引发了许多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传播主体问题。这包括传者问题和受众问题两个方面。从信息传播角度看，中国的网络传播者存在许多问题，比如信息虚假、网络暴力等。由于网络的虚拟性和监管力度不够以及追究程序的繁琐性，导致谣言、诽谤、诋毁等网络暴力等现象屡禁不止。网络推手或者称为“五毛党”的存在，使虚假信息的信息传播有增无减。从信息接受角度看，中国的网络修辞领域中也存在许多受众问题。网络拓展了网民传播权利实施的空间，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空前高涨，这是网络传播的积极面；但是，受众也往往表现出极端情绪化，他们藐视一切，怀疑一切，质疑一切，把一切都娱乐化，表现出“癫狂”倾向。

12“部分网民缺乏自律意识和自我规范,传播低俗网络文化产品,或是恶意煽动蛊惑他人,形成不文明、不理性、不负责任、不尊重他人隐私的网络环境。”

13这些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的国家文化建设和发展，进而影响了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也对中国新国家形象的建构产生了负面影响。目前，虽然国家也制定了相应的管理和惩戒律条，但是，由于对违背社会道德和违法行为的管理和追究成本比较高，导致目前尚难以抑制和控制网络暴力现象。

修辞模式问题。虽然中国的新媒介传播形态不断涌现，公共修辞态势正在形成，但是，固有的政治宣传模式依然存在。传统的政治宣传体制下形成的“国家媒体八股文”¹⁴[13]现象依然占主导地位。这显然不利于公共修辞传播，也不利于新国家形象的建构。网民受众心理的多样化，国际网民民族心理的多样性以及修辞文化传统的差异，使宣传模式面临严峻的挑战。因此，中

¹²陈汝东《论国家话语能力》，《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第71页。

¹³李玲、黄健荣《论当下中国公共治理中的网络话语表达》，《探索》2010年第4期。

¹⁴陈汝东《国家修辞：实现国家话语转型的新基石》，《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01期，2011年6月30日，第28版。

国的传统宣传模式需要变革，公共修辞传播的出现代表了这种变革的发展方向。

公共修辞秩序问题。自古以来，中国的修辞形态基本属于“个体修辞”范畴，缺乏公共修辞赖以存在的社会秩序或者说制度。因此，在网络等新媒介产生后，虽然呈现出公共修辞的形态，且在公共政策、公共利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公共修辞在许多方面依然缺少制度和秩序上的保障，原有的社会制度和秩序难以适应新的公共修辞形态发展的要求。虽然公众参与到了许多公共政策、公共事务领域，但是，在有些领域中公共意志并没有得到有效体现。比如，在中国医疗、房产价格居高不下，社会分配制度不公，城乡和社会阶层收入差距较大，公众对此通过网络等发表了他们的利益诉求，但是，这些意见和建议有些尚难以被有效地纳入公共政策议程。因此，建立公共修辞的政治、法律、行政等制度和秩序保障，是公共修辞秩序建设的重要前提。

公共修辞观念及教育问题。中国重行轻言的修辞伦理观念和个体修辞教育观念，制约了公共修辞的发展。目前，虽然中国网民在公共权利、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时，不再采取集体沉默的态度，可以通过网络表达出来，但是，其表达方式多呈现出不理性甚至癫狂状态，这影响了其公共修辞效果的发生。因此，中国网民的公共修辞观念亟待转变，其公共修辞素养亟待提高。此外，中国历史上很少重视公共演说修辞教育，目前依然延续着重视德行修养、重视个体书面修辞的传统，但是，这种既有的个体书面语修辞教育，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需要变革。

三、中国网络公共修辞的发展对策

根据中国的网络公共修辞传播领域所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以下针对性策略：

加强公共修辞研究，转变修辞观念。要解决上述近年来中国网络修辞传播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必须加强对近年来中国网络修辞传播特别是公共修辞现象、修辞手段和方法以及形态的研究，加强对人类修辞发展史的比较研究，在对比基础上，提出适合中国网络公共修辞传播发展的新理论。当然，这首先需要修辞观念上的更新和变革。显然，如果继续囿于传统的“修饰”、“调整”、“技巧”、“美辞”等修辞观，已难以对当前修辞形态发展的现状做出科学的阐释。需要把“修辞观”从微观的语词选择、调整，提升到社会行为、传播行为、社会秩序和文化制度乃至文明形态等高度加以认识。

提高公众公共修辞素养，改善网络修辞传播环境，提高网络修辞传播

质量。中国当前网络修辞传播领域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根本在于网络传播环境，特别是网民的修辞素养。显然，在中国的网络传播中，并不缺少传播者和受众，他们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空前高涨，但是他们的修辞素养特别是修辞伦理素养，却不尽如人意。因此，加强网民的修辞传播道德建设，提高其自觉遵守修辞伦理原则，维护网络传播的道德秩序，十分迫切。这不仅有助于提高网民的公共修辞素养，抑制不道德的修辞行为和现象，同时也有助于改善网络传播环境，提高网络公共修辞的质量和效率，有助于改善中国网民的国际形象。

加强公共修辞秩序研究，转变修辞传播模式。目前，在中国的网络传播领域，虽然涌现了大量的公共修辞现象，也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既有的修辞传统和宣传模式，依然大量存在。从人际传播到新闻传播，固有的以政党、政府等权势作为说服核心的现象依然大量存在。话语态度上的官腔，信息结构的行政化、程式化，以及传播秩序上的政治化，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网民心理需要，也难以切合国际受众的信息接受习惯。因此，在转变修辞传播观念的基础上，变革既有的政治宣传模式，从修辞角度，重新定位表达态度，根据受众心理选择修辞手段和方法，设置信息结构，无疑是转变宣传模式的正确途径。显然，政治宣传模式的转变，根本上还需要落实到修辞传播秩序建设上。这就需要加强人类的公共修辞秩序研究，逐步制定适合新媒介环境下网络公共修辞需要的传播秩序或制度，最终落实到国家的修辞教育之中。

强化国家修辞研究，创建新国家文化。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提供了信息传播的技术支撑，但是，也给迅速发展的国家经济提出了严峻的文化挑战。中国的文化建设和发展速度与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不匹配，甚至可以说落后。可以说，近30年的发展正在使中国向经济大国乃至强国迈进，但是，中国并没有提供与其经济发展速度相适应的国家文化产品。如果说，在经济领域中国正在引领世界的发展趋势，那么，在文化上中国也应该起同样的作用。中国应该为人类文化的发展进步，提供新的创造性的思想。要实现这一点，首先需要解放思想，需要创新国家文化。而新国家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不仅是一个政治、经济的建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国家修辞建构过程，是一个修辞说服过程。中国要通过国家修辞，展示其文化魅力。这不仅需要中国的政治领袖具备国家修辞意识和国家修辞能力，同时也需要中国的媒体、中国的网民具备国家修辞意识和国家修辞能力，掌握国家修辞的技巧、方法和规律。因此，加强国家修辞研究，创新国家文化，为人类发展提供新的创造性的价值观念，无疑是中国修辞学家、传播学家的一个重要任务之一。

综上所述，近年来中国的网络传播呈现出一些新的态势，不断涌现出新的传播方式、新的修辞现象，特别是网络公共修辞现象，这对中国政治、

论中国网络公共修辞
(On public Internet rhetoric in China)

经济、文化、教育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尽管这些新的修辞现象良莠不齐，利弊共存，但是，这些并不能阻止中国网络修辞传播的总体趋势：从个体话语走向公共话语，从民众话语走向国家话语，从国内话语走向国际话语。与之相应，作为提高话语传播效率的修辞，也正在从个体修辞走向公共修辞，从民众修辞走向国家修辞，从国内修辞走向国际修辞。修辞学研究正在从个体修辞学走向公共修辞学，从民众修辞学走向国家修辞学。

Rudong Chen is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t Peking University in Beijing, as well as President of the Global Rhetoric Society and the Global Alliance of Media Ethics and Law.